

文化意蕴的哲学觉解

——《谷雨沉思》读后

孙 德 忠

(武汉理工大学 政治与行政学院, 湖北 武汉 430063)

[作者简介] 孙德忠(1971-), 男, 湖北襄樊人, 武汉理工大学政治与行政学院副教授, 哲学博士, 主要从事马克思主义哲学和科学技术哲学研究。

[中图分类号] B-49 [文献标识码] E [文章编号] 1672-7320(2007)05-0797-02

人是文化存在物, 人的生存和发展与文化的生产和创造相互映现、相互确证。就人类整体而言, 文化既承载着人类活动历史性积累下来的结果, 成为制约着人类现实活动的基础和背景; 又转化为人类进一步从事活动的实践能力, 成为推动人类活动时代性发展的内在根据和前提。文化的生产和创造是人化与化人的双向运动过程, 二者是同步发展、正态相关的。就人类个体而言, 文化总是不可避免地浸润在个体的日常生活与生命历程中, 成为人们习以为常的活动方式和生活世界。因此, 个人可能受制于某种文化羁绊却茫然无知, 惠泽于某种文化资源却失之敏察。这样, 智慧之源将被堵塞, 意义根基将被抽空。相反, 只有通过文化进行深刻的反省与沉思, 人的精神成长史才能真正建立, 生命的意义和真谛才能不断得到开显与丰富。文化是具体的, 它有着完整的结构和多样的层次, 不能无边际地省思。科学、哲学以及生长在二者之间的科学哲学(在古代表现为自然哲学)总是透视文化结构和层次的重要维度。因为这种视角兼具形下与形上、感性与理性、实证与思辨、乃至入世与出世等辩证性质于一身, 它能化知识为智慧、化理论为德性, 直抵文化的内核和基质。当然, 这种视角既受制于个人视野、学养的宽幅, 也取决于生命阅历、体悟的深浅。可喜的是, 我们在黎德扬教授《谷雨沉思》(湖北人民出版社 2006 年 12 月版)中感受到了在这一视角下对文化进行深度反省的博大与真切。该书是黎德扬教授从教近 50 年学术研究和心路历程的回顾和清理, 由作者从近 500 余万字的手稿整理而成, 既有经年旧枝, 更多才发新苗。虽属文集性质, 但篇章的谋划和文章的选择却贯穿着清晰的线索, 将作者平生问学耕耘的几个主要领域连缀一体。《谷雨沉思》以“文化自传”为引, 分为“哲学理论与实践”、“科学哲学研究”、“科学文化研究”、“无神论研究”、“哲学教学研究”、“随笔杂记”等 6 篇。通观全书, 作者由科学到哲学、由哲学到文化、由文化到人生的学术进路和思想历程赫然醒目, 而所有这些都执著于和落实于对文化的深广意蕴进行哲学觉解。掩卷思之, 笔者认为, 该书值得珍视的方面是:

第一, 作者较早在国内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某些基础理论进行了深入的研究, 提出了一些有代表性的观点, 至今仍然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例如, 在关于同一、斗争、转化的涵义及其关系的思考中, 作者从经典作家的相关论述出发认为, 同一性和斗争性都是矛盾的具体属性, 它们都是相对的、有条件的, 只有矛盾的存在及其发展才是绝对的、无条件的。不能片面强调同一性和斗争性中的任何一个方面, “只有以实践为标准, 具体地把握和运用同一和斗争的关系, 才能正确处理矛盾, 促进事物发展。”无论是对当年“斗争哲学”肆虐的反思还是对于今天和谐社会的建构, 这种观点都可谓振聋发聩。另外, 作者对感觉的预设结构的客观基础和活动规律的分析, 对真理的客观性和实践标准的唯一性的探讨, 对政治法律设施的归属问题、历史进程的选择性和社会发展合理性问题的研究, 等等, 不仅深化了辩证法、认识论和唯物史观的研究, 而且对于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科书体系的改革与创新, 具有不容忽视的直接推动作用。1980 年, 黎教授受教育部委托作为主编之一编撰《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 该书曾印至 5 版, 发行愈百万册, 教育了数代青年。

第二, 在自然辩证法(科学技术哲学)的基础理论方面筚路蓝缕、辛勤耕耘, 开辟了若干极富时代气息和内在生命力的学术领域。早在 1982 年, 作者就着手引进和建立系统哲学。在“系统原理试探”、“系统哲学纲要”、“系统哲学是当代科学技术进步的深刻反映”等论文中, 作者对系统原理进行了全面深入的分析和论证, 特别考察了黑格尔的哲学系统工

程思想和马克思的社会系统工程思想,从对唯物辩证法的丰富和发展的角度论证了系统原理的地位和意义。后来,作者又提出系统哲学是当今综合时代的综合哲学的观点,进一步指明了系统哲学的哲学品格,论证了系统哲学的本体论、认识论、方法论和价值论意义,初步构建了系统哲学的学科体系,推动了现代自然科学与哲学结盟的时代性发展。

在20世纪90年代的“文化热”和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的讨论中,作者从自己的专业背景和学术专长出发,开创了科学文化特别是中国特色科学文化这一新的研究领域。其贡献主要有:以中国古代思想家傅奕、吕才和熊伯龙为个案,发掘了中国古代的无神论思想,并深入分析了中国古代科学文化的特质和我国科学自明清以来逐渐落后的原因;结合“索卡尔事件”在世界知识界引起的轰动梳理了两种文化分裂的根源和协同的可能,积极关注并努力批驳国际反科学主义的种种思潮,呼吁在当代中国仍需继续弘扬“五四”科学精神,切实提高全民科学文化素质。目前,我国关于科学文化的研究方兴未艾,并形成了种种建制化的保证。应当承认,这些都与作者的努力密切相关。

第三,从当代中国社会发展这个较大尺度的时空背景来看,《谷雨沉思》不仅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而且具有十分鲜活的思想史、文化史、乃至社会史价值。众所周知,新中国成立以来的50余年间,社会生活和思想文化领域相互交织,不断发生着剧烈的变迁,其间既有昂扬的欢歌,也有悲凉的血泪;既有成功的经验,也不乏沉痛的教训。所有这些都对当代中国面向21世纪的新发展有着直接而深远的制约作用。这是一段不仅不能被淡忘更不能被曲解的历史。黎德扬教授从20世纪50年代就走出了家乡湖南浏阳,走进了学术界,以他的所见、所思、所事,用理论思维的方式参与、记录、见证了这段驳彩斑斓的时空,这就使《谷雨沉思》具有深广而厚重的历史内涵。

新中国成立伊始,百废待举,“向科学进军”的号角激荡在每一个热血青年的胸间,作者正是在这一理想的感召下投身自然科学。但由于种种机缘,特别是社会发展对理论人才的需要而走进了哲学的殿堂,从此便与倔强而固执的哲学沉思如影随形(以这种方式走进哲学,其实不仅限于黎老一人,这似乎是当时我国哲学事业发展的特有“现象”)。尽管身系哲学之门,可心中固存的科学情怀却仍难割舍,只是关注的角度发生了改变或提升。于是,数学与实践的辩证关系、关于数学的模糊性、从认识论看宗教与科学的关系、自然科学家信仰宗教的原因、从对光的本质的认识看实践对理论的检验等论文的相继出炉,便顺理成章,成为“科学的春天”里的一朵朵耀眼的鲜花。

10年“文革”,学术窒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中国社会终于迎来了思想文化和社会发展的黄金期。作者当时正处盛年,倾极大的热情于真理标准的讨论中,并活跃在哲学研究的最前沿。相对性和绝对性是同一个真理的两重属性、真理的适用界限问题、真理能不能一分为二、客观真理都没有阶级性、实践标准的唯一性和自然科学的真理性的等等诸文,或创意自立,或辩驳诘难,或谆诲后学。于今再读,仍能感受到作者思辨的激情和理性的启示。观微知巨,其实这不仅仅是作者个人的理性追求和激情释放,它折射着当时社会整体呼唤理性、渴望真知的思想文化氛围。

综合考量《谷雨沉思》大致按时间秩序排置的几个研究领域,不难发现,黎老一生学术研究兴趣的更替和递进不是偶然的,支配着这种更替和递进的深层基础乃是哲学自身发展的逻辑。进言之,黎老一生学术研究转换和进展的线索,其实是50余年来中国哲学曲折发展的缩影,是当代中国思想文化进程的微观显现。如果注意到作者在“文化自传”中对自己求学、工作经历的平实记述,那么,本书的社会史意义便也会清晰地彰显出来。

第四,坚持真理,实事求是,将理论与现实关注紧密结合,是《谷雨沉思》的一个显著特点,也是黎老一贯的学术追求。通观全书可以看出,黎老一生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坚持走自己的路,独立思考,从不人云亦云,也不做应景文章,敢于思考所谓敏感话题或学术禁区,体现了一个真正的思想者对真理的不懈追求。而学术前沿与现实问题的结合、理性思考与科学方法的结合、自己的学术研究与对学生的关爱的结合,也在全书随处可见。例如在改革开放向纵深推进时,他就着力研究社会主义社会的矛盾问题和在改革实践中坚持唯物辩证法的问题;他就运用信息论、控制论的原理研究开发长江的认识论问题和社会交通的整体观,甚至对地方科技、经济发展也提出了许多具有很强针对性的对策建议;面对青年学子求学和人生的困惑,他提出了济民的理想、明志的途径和参悟的境界,以求自勉共勉,恪尽传道授业解惑之天职。全书字里行间渗透着这样一种精神:哲学研究不应只是书斋里的枯肠苦索,学问之道也不仅仅只是唯求心安,更不能成为为一己稻粮权谋的工具,而应该敢于直面铁肩道义和承担社会责任。联想到当今学界所谓“学术繁荣,思想淡出”的虚浮现象,黎老这种追求真理的理论勇气和关注现实的人间情怀尤其显得难能可贵。

黎老在“自序”中借笛卡儿的话谦恭地说:“我既不想得到一般人的什么好评,也不希望很多人读我的书。”笔者以为,大音从来稀声,真言本就澹澹,思想者只期待与思想者的相遇,思想者的思想结晶一定会因思想的机缘照亮不倦的爱智者。《谷雨沉思》,亦可当作如是观。